

在室外，而冰天雪地的冬天就搬到室內球場，一週一次從不漏掉。雅普的球藝與我旗鼓相當，有時他贏，有時我贏。

一九七七年，我回台大當客座教授，發現那時硬式網球在台灣已相當普及。我在台大時並無定時地打網球，也沒有固定的球友。有一天，我內人的哥哥，當時台大外科的謝健民醫師邀我到圓山俱樂部打球，他是圓山俱樂部的會員，圓山俱樂部當時是沙地球場，我打起來要能習慣真不容易。在球來球往當中忽有一球，我以為我的搭檔可以接卻沒接好，我急忙跑到前面去救球而做了一個急停的動作，我的右膝關節當場凍結不能彎曲也不能動了，當場只好用球拍當手杖支撐退出球場回家。

那時外科的李治學教授還在世，他急忙來到我住的南京東路，即我下榻的二姊家，從右膝關節抽出了三十西西的全血，顯然右膝節的某組織或肌骨斷了，李教授因此建議我馬上住院。我依他建議，住進了台大一西病房。

——造假的病歷——

台大一西病房是骨科病房，而且是二等的，中間那一床住的是患有慢性糖尿病、腳趾壞死的病人，病灶還會發出陣陣的惡臭。我在一西病房一住院，等了一下，來了一位姓L的實習醫師，問了我的病例並做一番檢查，根據他的記錄，我的血壓是一百二十八／八十。不久來了一位H教授，是台大現在的骨科專家，由L醫師陪同。L醫師在H教授看我的當兒，問H教授說黃教授這個傷害要多久才好？H教授答以約二週。我當場覺得H教授沒有抓住機會教實習醫師，臨床教學應設法常引起實習醫師的興趣，例如說，當L醫師問幾個禮拜會好的時候，可以要求L醫師去看有關膝關節的描述，看我的傷害是什麼程度與什麼部位再說。讓這機會白白地溜過去是很可惜的事。

最近我看了路德摩爾(Kenneth Ludmerer)的《醫治的時機》(Time to Heal)，深覺我一九七七年所感覺到的實習醫師角色的疑問，最近又被重炒，並不偶然；因為提不出正確的答案，所以「實習醫師的角色是什麼？」的懸案就一直掛在那裡。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現在都不再被要求這一段訓練過程了。

L姓實習醫師的故事還沒完。話說H教授離開後不久，第二位來看我的是內科的故事許成仁教授，他看見我孤單地在一西病房，旁邊還有會發出陣陣惡臭的病人，馬上建議我搬到內科的第九病房，我也同意。我很感謝許教授的建議，那時我因為有高血壓的家族史，心裡決定這一下子搬進內科病房一定要做高血壓的總檢查。

到了第九病房，來了一位名叫楊淑敏的內科女住院醫師，楊醫師是花蓮人；當我告訴她有高血壓的家族史時，聽我這麼一說，她馬上拿了血壓計幫我量血壓，結果一量收縮壓（高血壓）是一百七十，她不解地加了一句話：「奇怪，昨天在外科，西病房您的血壓是正常的，一百二十八／八十，今天為什麼那麼高呢？」我回答說：「昨天在一西病房並沒有人量我的血壓啊？」有病例記錄，但沒人量過我的血壓，顯然L醫師的記錄是人工造假的。

我曾說過，病人那時的血、尿、大便皆無機器可以代勞檢驗，得由實習醫師親手檢查。實習醫師因為懶惰，遂以Intern method（應當方法，指實習醫師造假），沒想到L醫師連當客座教授病人的血壓也造了假，未好好地量而隨便在病歷上寫了一個數字。我只能嗟嘆L醫師的命運崎嶇，碰到我這個造假不了的高血壓病人。

想想看，將來一定會有醫師做一個統計，我的血壓會是其中的一個數據，而從一西到第九病房，血壓就高到一百七十，是什麼原因呢？做統計的醫師還得煞有其事地非解釋一番不可呢！因為自己一時的懶惰而亂了別人的研究步伐，真是笑話。

過了幾天，同學出版的《青杏》雜誌開了會，是學生們主持的編輯會，我也被邀請參加。我當場全盤托出L醫師造假的事，並說這種造假的習慣可能會害死病人，千萬要不得。話傳來傳去，傳到L醫師的耳朵裡，當晚兩點左右L醫師來看我，向我道歉。我當然接受，但我告訴他，還好台灣不講究推薦書，如果這在美國，你就休想有醫業前途，因為美國這個國家的整個社會是靠推薦書織成的，而L醫師的這個行為一旦敗露，就很難拿到像樣的推薦書，也就難找到像樣的工作。希望他真的瞭解我的苦心。

蒙塔尼耶教授

我是一九八二年回台南的（見《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一九八〇年代的國科會主委是陳履安先生，他創立了所謂的邀請講席制度。這個制度是邀請在某個領域知名，而且是在世界上地位夠高的學者來台，給予五千萬美元的報酬，在指定的場所做三場的演講，期間的交通要在這五千萬美元裡支出自理。當邀請講席制度建立後，學術界第一位利用的人是我，我第一次牛刀小試，邀請了羅伯·蓋樂（Robert Gallo）來台，第二年的第二位請的是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當時他和羅伯·蓋樂還在為誰先分離出愛滋病病毒一事爭論不下而打官司。蒙塔尼耶在成大醫學院、台灣省醫學會年會及台大醫學中心發表三場演說，他是在法國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供職的病毒學家，是第一位分離愛滋病病毒的專家。在該年六月或七月和他通信發出邀請時，

他立即回應答應該年十一月將抵台做三場演講，我以為事已大致底定，不橫生枝節。哪知九月左右，蒙塔尼耶的音訊突然斷掉，我再寫信也無回音，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緒。恰好九月將結束時，巴黎來了一位神經外科醫師，名為喬治醫師（Dr. Georges），這時距台灣省醫學會年會剩一個多月。我請喬治醫師查驗一下我與蒙塔尼耶的書信來往，想查明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我把和蒙塔尼耶之間的書信統統攤開在我辦公室的茶几上，順著時間的進行排列，請他檢視。喬治醫師看後開口說：「沒有，沒什麼差錯，但我有一個建議，從今以後和蒙塔尼耶寫信，請不要直接稱他蒙塔尼耶博士（Dr. Montagnier），而要稱蒙塔尼耶教授（Professor Montagnier）較妥當。」這給了我一個學習歐洲風氣的機會，之後在與凱爾（Professor Keil）及文樹德（Professor Unschuld）兩位教授聯絡時皆發生了好作用，也應證了喬治醫師的話。

當年十月初，我另外訪問了蒙塔尼耶教授於他的研究室，發現他的沈默與音訊全斷，除了喬治醫師指出的稱呼習慣問題以外，他還對我訴說，認為五千元美元太少了；他飛的是頭等艙，而且這趟來台，中途沒有取道任何國家，沒人共同負擔旅費，五千元美元僅夠旅費而已。我因為性格很急，而且又時間緊迫，遂決定讓五千萬美元全部都入他的口袋，旅費與住宿費全由我負責設法。怎麼

設法？就是向企業家募款，請他們捐款贊助。事後結算這次邀請蒙塔尼耶教授，共用了三十多萬新台幣。

蒙塔尼耶教授是很容易取悅的人物，我除了借來竹中校友周宜旋的凱迪拉克豪華轎車接送他之外，還把他安頓在位於中山北路有法國風味的老爺飯店。邀請結束，在送他到桃園國際機場時，我問他這次招待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結果他說老爺飯店的床太硬了。這使我覺得他是一位十分挑剔的人物，與蓋樂博士的義大利衣鉢迥然不同。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剛從成大醫學院的院長職務下台不久時，有一次，在一次演講會裡必須說一些德語，會後德國Giesen藥廠有位名叫黑希斯特(Hochst)的代表靠過來，問我德文的發音為什麼那麼標準。他的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我回台南後，就打了電話給黑希斯特，問是否可以提供我一萬美元左右的獎學金，好讓我在歐洲這歷史悠久的西方醫學據點巡一次禮，我並以「西方醫學歷史巡禮」為這獎學金之名，結果他一口答應。

我為此寫了很多信，經過一番折衝，我選定了瑞士的蘇黎世(Zurich)、德國的渥茲堡(Wurzburg)及慕尼黑、蘇格蘭的愛丁堡及英國的倫敦。以這五個地方為據點，我各做了聯繫，例如瑞士的蘇黎世是蘇黎世大學的醫學歷史博物館、德國的渥茲堡是該市大學的歷史研究所所長凱爾

教授、慕尼黑是慕尼黑大學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文德教授等，皆有事先的書信往來。這次書信往來因有蒙塔尼耶教授與博士頭銜在歐洲的前車之鑑，用稱呼時特別小心，而一舉成功。

——托瑪斯·曼——

到了瑞士的蘇黎世，住進大學推薦的旅館，歐洲的旅館一般比美國的貴而且狹窄。這是我第一次訪問蘇黎世，這次的目的是：一、看它的博物館；二、拜訪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墓；三、如果醫學歷史家艾克內齊(Ackerknecht)還在世，想和他見面；四、觀光。這四個目標都順利完成，其中關於托瑪斯·曼，我要在此多加憶述。

托瑪斯·曼是一九二九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人，他生於德國北部漢堡附近叫呂貝克(Lübeck)的地方。他是猶太裔，因不滿希特勒的反猶太政策，很早就離開德國，移往美國，在美國住了幾年，因倦怠於美國的虛偽主義而遷往瑞士講德文的地區渡過了餘生。托瑪斯·曼寫的幾本書，皆與醫學或病人的心態有關，像《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就是很好的例子。因為他寫醫師與病人的心理變化太細膩，使得他的每一本書都很厚，有時候讀者看他的書會看不下去，因此熟悉托瑪斯·曼的人較少。龍應台曾寫一本書叫《乾杯吧！托瑪斯曼》，裡面所寫的托瑪斯·曼就是他。

倒是呂貝克另外出現了一位年輕的大提琴家，由台北的鋼琴家蔡采秀女士介紹而常到成大醫學院來表演的霍赫慕思(Reiner Hochmuth)，他在成大比托瑪斯·曼還有名。

有一次，現在在成大眼科擔任主治醫師的陳筱彥，當年她來參加七年制醫學系的入學甄試時，在自傳裡講到她的嗜好是看經典之作。當時我還是成大醫學院的院長，我們成天有一特別的面談方法，是五位教授問一位考生五十分鐘，所有的問題由自傳開始，所以甄試學生心理上要有準備，在自傳裡寫什麼，很容易成為當時甄試面談的起點。陳小姐也不例外，我第一個問題就問道哪一位是她常看的經典作家，結果她的回答是托瑪斯·曼。這就使我很覺尷尬，因為我很擔憂在座的其他四位教授沒聽過托瑪斯·曼這個人，遑論看他所寫的書。幸好我還看過他的書三、四冊，我問她，是否能把《魂斷威尼斯》的讀後感及托瑪斯·曼在這個故事中所欲說的結論敘述給我聽，她於是照她的感覺說了一遍。中間我針對與我看法不同的地方與她討論了幾句話，我以為這輩子就結束了我的

面談，而輪到別的教授問她。

不料陳小姐回家約兩週後，寫了一封信給我，信裡說那天面談時因對《魂斷威尼斯》一書的讀後感與我不同而起了一點爭論，她回家後，再看了該書一遍，發現她的論點還是對的，錯的是我。我立刻請了當時負責教務的張文昌教授吩咐他，如果她的面談成績還不錯，記得一定要錄取她。

因為有這個故事而龍應台又共襄盛舉，故托瑪斯·曼在我心裡有了特別的位置。後來托瑪斯·曼的女兒艾力卡·曼(Erica Mann)用德文寫了托瑪斯·曼的一生，我也看了。

我想見的另外一個人是艾克內齊，但到了蘇黎世才發現他已經去世，所以就省了這個行程。

——渥茲堡的凱爾教授——

德國南部的渥茲堡是很早開發的城市，是當時羅馬天主教的主教所在地，有很大的主教(Bishop)的住宅(Residenz，英文叫Residence)，我訪問該地已不是第一次了。該地因為開發很早，因而大學也頗有名，以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受獎而出名的倫琴(Wilhelm Konrad Roentgen)就是

在渥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Wurzburg)時發現X光的，他的實驗室現在成了觀光據點。

倫琴的實驗室儀器一大堆，表示他所從事的研究當時是多麼的複雜而難做，但這也突顯倫琴對醫學的貢獻之大。他是把醫學診斷帶到病人體內的第一人，許久以後才問世的核磁共振攝影(MRI)、電腦斷層攝影(CT)及正子斷層攝影(PET)借X光帶頭的地方很多，所以一九〇一年他拿到諾貝爾獎的第一屆獎賞是受之無愧的。據紐蘭(Nuland)在*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一書中的分析，倫琴一輩子只發表了四篇論文，但這四篇跟一八四〇年代的塞麥爾維斯(Semmelweis)，以及十七世紀哈威(William Harvey)一生只有一篇論述相比起來已經多很多了，再比起現時的環境，我只能說時代變了！

渥茲堡還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一是維蕭(Rudolf Virchow)，一八二一年生於德國一個叫席維班(Schivelbein)的地方。他是十九世紀德國醫學的天才，在二十幾歲時就已經分出了血栓與栓塞，而白血病現在的通用外語“leukemia”就是他取名的。但當柯霍(Koch)分離結核病菌時，他始終不相信結核病是感染引起而出名。他後來成了人類學家以及終身的國會議員。亞伯拉罕·佛萊斯納(Abraham Flexner)曾經在十九世紀約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醫院的建設時期去德

Geehrter Herr!

Ihre Röhren sind in der That sehr gut, aber für meine Verhältnisse zu theuer, ich brauche doch die Röhren nicht bloß zu den bekannten Versuchen, sondern, wie wohl einleuchtend sein dürfte zu vielen anderen Experimenten, bei welchen die Röhren ganz anders als in der normalen Weise beansprucht werden; die Folge ist, daß sie eher zu Bruch gehen. Ich möchte mir deshalb die Frage erlauben, ob Sie mir die Röhren nicht zu M. 20 statt zu M. 30 liefern könnten; nach meinen anderweitigen Erfahrungen dürfte dieser Vorschlag wohl acceptabel sein, da es sich doch um einen Ausnahmefall handelt, und Ihnen vielleicht weitere Bestellungen von meiner Seite angenehm sein könnten.

Falls Sie auf meinen Vorschlag eingehen, bitte ich sie mir für die zwei bereits verbrauchten Röhren 4 andere gleicher Qualität – und zwar zwei kleinere und zwei größere zu schicken.

Hochachtungsvoll

Dear Sir,

Your x-ray-tubes are indeed very good, but too expensive for my situation, after all I need the x-ray-tubes not only for the known experiments, but, as should be obvious, for many other experiments which put much more wear on the x-ray-tubes than normally done. Consequently they are ruined earlier. For this reason I take the liberty to ask you, whether you could send me the x-ray-tubes for 20 Marks instead of 30 Marks. From experiences I have made elsewhere this proposal should be quite acceptable, since it is an exceptional case and you might perhaps be interested in further orders from my side.

In case you accept my proposal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replace the two already used x-ray-tubes by 4 others of the same quality – namely two smaller and two larger ones.

Sincerely yours,

Brief von Prof. Röntgen an Reiniger, Gebbert und Schall – heute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Bereich Medizinische Technik – in Erlangen, vom 27. November 1896.

Letter of Prof. Röntgen to Reiniger, Gebbert and Schall – now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Medical Engineering Group – in Erlangen, dated November 27th, 1896.

Überreicht durch: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Bereich Medizinische Technik, Erlangen
Geschäftsgebiet Dental, Bensheim

Presented by: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Medical Engineering Group, Erlangen
Dental Sector, Bensheim

倫琴的來信（打字版）。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231

維蕭在渥茲堡，共九年，是在柏林的三月革命未成後的事情，他未曾懼怕前後而敢於批評政府，惹得俾斯麥宰相曾經要與維蕭決鬥一決生死，幸而遭維蕭所拒，不然德國的醫學就少了一個天才。不像倫琴，維蕭創辦了現在還刊行的醫學雜誌，

Physik. Institut
4. Univers. Würzburg.

Würzburg 27. Nov. 96

Herrn Reiniger, Gebbert & Schall
Erlangen

Geliebte Herren!

Ihre Röhren sind in der That sehr gut, aber für meine Verhältnisse zu theuer; ich brauche doch die Röhren nicht bloß zu den bekannten Versuchen, sondern, wie wohl einleuchtend sein dürfte zu vielen anderen Experimenten, bei welchen die Röhren ganz anders als in der normalen Weise beansprucht werden; die Folge ist, daß sie eher zu Bruch gehen. Ich möchte mir deshalb die Frage erlauben, ob Sie mir die Röhren nicht zu M. 20 statt zu M. 30 liefern könnten; nach meinen anderweitigen Erfahrungen dürfte dieser Vorschlag wohl acceptabel sein, da es sich doch um einen Ausnahmefall handelt, und Ihnen vielleicht weitere Bestellungen von meiner Seite angenehm sein könnten.

倫琴的來信。

國，請教過他所好的醫院應該具備的首要條件為何，維蕭答以：「病理。」這與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的首任院長是病理專家，而佛萊斯納的兄弟賽門（Simon Flexner）變成一位洛克菲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中擅長病理者不無因果關係。

Falls Sie auf meinen Vorschlag eingehen, bitte ich Sie mir für die zwei bereits verbrauchten Röhren 4 andere gleicher Qualität – und zwar zwei kleinere und zwei größere zu schicken.

Hochachtungsvoll

Prof. Dr. W. C. Röntgen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230

而且一輩子裡是一年上百篇的論文，但他不是爲了升等而寫的，這是與現時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位出身於渥茲堡而對日本西方醫學貢獻極大的是西博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醫師，可惜他有名的博物館在渥茲堡是空空如也，主要的博物館在慕尼黑，殊爲可惜。

國內對這位對日本的西方醫學做了重大貢獻的德國人西博德醫師一定生疏，我曾有機會在日本長崎及他的出生地德國渥茲堡市的凱爾教授處獲得有關這位傳奇人物的資料，深爲他對日本醫學所做的豐功偉業所感動，故記於後。

西博德一七九六年生於醫學名門，他學醫於渥茲堡大學，但對動物、植物以及民族人類學亦涉獵頗廣。他生性好奇、冒險、犯難，不適開業生活，不久成爲殖民大國荷蘭陸軍的軍醫少校，前往今日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因其才華被上司賞識，一八二三年被派到位於日本長崎港內叫出島的一小島上的荷蘭商館擔任專屬醫師。當時把西學帶入日本的是以荷蘭人帶來的所謂蘭學爲主流，長崎一帶已聚集了有心想學習西方醫學的日本人士，西博德也就利用時間傳授醫學。當時的日本是鎖國，荷蘭人雖在港內的小島享有據點，但仍不能隨意踏上日本本土經商，唯有西博德卻被特准上岸診治病人，其名聲因而遠播。不久他與一日本女性德基(譯音)結婚，並於一八二七年生一女兒名伊內

(譯音)。德基爲了與西博德結婚還把身分改爲妓女，因爲當時良家婦女不得進入出島。一八二四年西博德在長崎郊外的鳴瀧購下民房，名其爲鳴瀧塾，收下門徒數名，講授西方醫學，並由門徒協助他對日本的生態民俗等範圍極爲廣泛的研究。鳴瀧塾不但成爲醫學校，也是當時科學新思潮在日本的傳播中心，現在改爲紀念館。一八二六年西博德遠途跋涉到東京(江戶)，晉見幕府將軍，他的研究也隨著擴展到了東京一帶及沿途各地。

一八二八年西博德在長崎五年任期屆滿，必須回國述職，乘船離開長崎，但遇颱風而船隻擱淺，幕府人員上船檢查時，在西博德行李內查出日本地圖及生態研究的資料，被判觸犯了不准任何人士攜出日本風土資料的禁令，西博德因而被監禁於出島，並於一八二九年被驅逐出境。西博德因爲掛念達基和伊內的生活，把個人所有皆留給妻女，並指示門徒們如何繼承他未完成的研究。回到歐洲的西博德則全神獻身於介紹日本給歐洲，有鑑於清朝因鴉片戰爭受辱，西博德不忍類似情況在日本發生，故進言荷蘭國王維廉二世，去函幕府勸告開國，也曾透過俄國宰相及美國貝里提督做同樣的努力。這些努力，對後來的明治維新一定有所影響，他所著的《日本》、《日本植物誌》、《日本動物誌》更是被奉爲曠世之作。

西博德於一八五九年獲得重返日本的機會，但時已過境已遷，當時他年六十三，已在德國再婚，這次訪日有長子亞歷山大隨行。德基在日本也已再婚，生一男孩但不幸幼逝，與西博德所生的女兒依內則從師於西博德昔日的門第，及從數名荷蘭醫師習醫，成為日本首位女性產科醫師，在明治天皇的皇子出生時還擔任接生的工作。西博德和德國配偶海倫(Helene)之間育有三男二女，長子亞歷山大來日之後，十五歲時就擔任了英國駐日公使館的翻譯官，後來成為日本駐羅馬及柏林公使館的日本官員前後約四十年。其弟翰利則成了奧匈駐日公使館的代理公使多年。西博德一家人都為日本的醫學及外交做了不滅的貢獻。

渥茲堡有西博德的紀念館，但所藏有限，不值得訪問，值得看的是位於慕尼黑、藏有西博德蒐集的日本民藝品紀念館。我從這一故事得到三點啓示，西博德的傳奇有如蘇格蘭醫師萬巴德在台灣、廈門及香港的事蹟，兩者傳授醫學於異國皆與人類愛有關，但非傳道。第二是西博德返抵荷蘭那段時候是中國成為西方強權組上肉的開始，日本與西方勢力接觸，卻沒被迫簽下一大串不平等條約，中日之別究在何處？日本是如何贏得了別人尊重的？這是我們該做反省的一點。第三：這故事充分顯示醫學是無國界的。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留學日本的大陸學者錢國洪的《日本と中国に於

ける西洋の発見》一書，以及李登輝的《武士道解題》中也有言及。

凱爾教授對西博德醫師的歷史知道得特別詳細，給了我不少的資料閱讀。他的研究所依山建造，也有一個小小圖書館。他也請我們到他家進午餐，他家裡面的裝設比起美國一般家庭也毫不遜色，而且較現代化。

他和夫人的健康都不太好，尤其是他夫人，幾乎是一位盲人，在家走動完全靠熟記家內物品的位置，故他家裡整然有序，並未發生任何事故。

多年後國家衛生研究院來了一位出版科學雜誌的赫爾·凱爾先生(Herl Keil)來訪問台灣的醫學教育問題，訪問結束後我問他：「我幾年前曾經去過德國的渥茲堡而在該大學的歷史研究所遇到一位和他同姓的人，凱爾這個字並不常見，姓這個姓氏的人亦不多，你認不認識他？」結果他回答：「凱爾教授是我的哥哥！」當場令我對天下之小有了新的感觸。他說過幾天是他們的母親九十多歲生日，凱爾教授也會遠從渥茲堡前去聚會，問我有什麼話要對凱爾教授說。我於是當場寫了一封短函托給他帶回德國，過幾天後就收到了來自凱爾教授很恭維的一封信。

這簡直是個奇蹟的故事，只能在記憶力強而動用聯想力之下才能發生的好例子。

「慕尼黑」

文樹德教授，其夫人名叫文淑德女士(Frau Unschuld)，我見到他之前尚不知他到過台灣，講一口相當流利的中文，他被中國大陸人士認為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對中國傳統醫學研究得最到家的一個人。他著有《中國的醫學》(*Medicine in China*)等膾炙人口的中國傳統醫學書，其中很大的貢獻是他把本草綱目、皇帝內經及傷寒論譯為德文，並將中國醫學廣為傳播於歐洲。

先前，喬治醫師指點我如何稱謂蒙塔尼耶教授一事，對我身為學術機關做事的人來講很有效力。在歐洲，教授頭銜是很尊貴的，寫信時要先寫教授，即Professor，然後再寫博士，而且有幾個博士學位就寫幾個博士稱謂，像文樹德教授有兩個學位，即藥學及東方文化哲學學位，他的英文頭銜則為Professor & Dr. Dr. Unschuld，聽起來有點奇怪，但說來是歐洲的習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在慕尼黑只待了約一週，因為我有教授的頭銜，故獲得一間研究室，一個共用的秘書及打字機，極為方便。

文教授讓我大為吃驚的第一件事是他會講中國的普通話，我打電話報告我已到慕尼黑時，他用中文回答是我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文教授那裡遇到了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名叫鄭金生的醫生，他是中、西醫合併的化身，我和他談了不少話，有一次我問他：「大陸的中、西合併進行得怎樣？」他告訴我現在大陸還是停留在以西醫方式診斷病人而以中醫治療的程度，他並且提到中國大陸現在有三種醫生：第一是正統的西醫，第二是正統的中醫，第三是不中不西的一種；「中、西合併是貌合神離的說法！」他說。我認為中、西醫是根據完全不同的哲學做出發點，兩者很不容易合併。文樹德教授有很大的工程要做，但他的方法是中醫當中醫看待，並沒有徹底合併中、西醫兩者的意圖。

慕尼黑是一個文化水準極高的地方，是拜爾倫的首都，曾經出過一個國王瘋狂地喜歡華格納的歌劇，叫路德維希二世(Ludwig II)。慕尼黑承襲這個傳統而有一個很大的歌劇院，我趁訪問慕尼黑時也偕同內人去欣賞了現代化的卡門，誰料文樹德夫婦知道我們去看那歌劇，後來也買了兩張票去看同一場的歌劇，並邀我們在結束後一起到廣場對面的飯館共進晚餐。

——愛丁堡——

蘇格蘭是很神秘的一個存在，老一代的蘇格蘭人殘暴成性，不亞於英格蘭，這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與藍大弼醫師的見證，看過「英雄本色」這部電影的人都會覺得我的觀察是對的，這是因為蘇格蘭地處受維京人影響最深的一個區域。

蘇格蘭人也是十九世紀負責在台灣布道的長老教會派，這我在另外的文章裡提過。蘇格蘭的這個冒險精神從她雖地處北部，卻成了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先鋒，以及領導了熱帶醫學的研究與發展即可見一斑。蘇格蘭的偵探小說家特別多，這是不是承襲福爾摩斯作者傳統的痕跡還將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愛丁堡是新舊兩區互相編織而成的，愛丁堡大學的大部分皆位於古城。愛丁堡有一所聞名世界的病理博物館，我的目的在訪視該博物館，因為內人專攻的領域最後還是病理，所以這次訪問很是稱意。另外使我們很高興的是，我們的大女兒將以愛丁堡為起點與我們一同去倫敦，我們家因此有了小小的團圓機會。

成大醫學院的生化科有位吳昭良教授，他的夫人是微生物科的蕭瓊琍教授，兩人的博士學位都是從愛丁堡大學獲得的。她們的大女兒名Ponse（中文名我已忘記）後來獨自留在愛丁堡，也在該校醫學院畢業而獲得頭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Ponse在醫學院還未畢業前，有一次欲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學習兩個月而被拒，後來經我向美國在台醫藥協進會（ABMAC）的主席杜魯諾（Turino）說情後才又被接受。讀者如對美國在台醫藥協進會有興趣，可參考該會的會史。

——倫敦——

英國的首都倫敦是一個永遠的都市，曾經出過幾位科學家、藝術家與作家，是世界音樂劇的出生之地。

倫敦以衛爾康公司（Wellcome Co.）而聞名於世，另有一圖書館叫做衛爾康醫學歷史研究院（Wellcom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我這次訪問倫敦的目的也是訪問這一所圖書館。它是一開

放式的圖書館，什麼人都可以自由進出，只要換個證件就可以。倫敦的地下鐵叫 Underground，從我住宿的旅館 (Intercontinental Hotel) 可坐地下鐵直達圖書館，我在這圖書館看了不少有關醫學歷史的書。

順在倫敦之便，我們也看了「歌劇魅影」及「西貢小姐」的歌劇，訪問了保護得很安全的戰時邱吉爾內閣的辦公地點，以及狄更斯的住所。

在倫敦時恰好遇到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每年那一段時候的倫敦天氣陰霾，隨時會下雨。我女兒極力勸我這是一生中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要我們一定要花一天時間去觀賞，由她買票。我問她票價多少，才知道週六的決賽票價要一張一千英鎊，就連週三、四、五的比賽門票也要五百英鎊一張，而且很多座位都是在一年前就訂好，當場購買要透過公司行號的關係才可到手。於是我與內人皆打消念頭，沒去溫布頓，去了大英博物館了事。

總而言之，黑希斯特給我一萬美元獎學金我沒有白花，而且收穫很大，例如文樹德教授就是一個好例子。

文樹德與哈利·溫斯頓

——文樹德教授——

文樹德教授的事在前文已經略述過，他一生最大的企圖是在柏林建立一所全德國性的中醫學研究所，這個企圖的最大問題是經費，他認為我在台灣及美國的面識廣，可以幫他這一方面的忙。

我最初想到的是哈利·溫斯頓 (Harry Winston) 珠寶店，因為該店的老闆溫斯頓先生曾提供研究基金給哈佛大學研究愛滋病病毒。但溫斯頓先生是一個猶太人，而文樹德是德國人，情理上我不知如何開口。

有一天，吳東進先生於他在台北101附近所蓋的信義傑士堡開了一個餐會，在那會中第一次經

吳先生介紹，見到了吳先生在美國留學剛回台、專攻分子生物學的女兒，吳先生並說他近期將帶著女兒訪問慕尼黑等語。我問吳先生他在慕尼黑有無朋友，他說沒有。我於是跟他提起文樹德教授，告訴他我可以介紹，吳先生說好。吳先生和文樹德教授的友誼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吳先生把我介紹朋友給他的事當作一回事，我從她的秘書陳小姐處獲悉，吳先生還買了禮物去見文教授而成了好朋友。吳先生回台後，文教授被吳先生所經營的基金會邀請，與夫人一起訪問了台灣，住在信義傑士堡。信義傑士堡是設備齊全而很豪華的旅館，有種種設備是台灣的豪宅裡沒有的，譬如裡頭的游泳池是又乾淨、溫度調節又恰到好處，是台北罕見的泳池，所以文樹德教授伉儷在台有如國王一般。時在二〇〇六年八月，我已不需再做任何牽線工作。

文教授後來捎來電子郵件，說與吳先生有關的發展不太如意，但因二〇〇六年他受邀在台灣各地演講，又因為接受國立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的聘書，於是於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二次來台。這已使他雀躍不已，因為我能為他打開了一條新路。文教授現已遷到柏林去了，所計畫的全國性中國醫學研究院士也有進展。

文教授來台的滿意度也可以從馬汀·費雪狄斯考教授 (Profes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最近的

一件事情看得出來，原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任命其為準音樂總監，如果這一年的表現滿意，明年將被任命為正式的音樂總監，指揮該交響樂團。他因聽到文教授住在信義傑士堡的待遇，又聞吳先生喜歡歌劇，故提出住在信義傑士堡的要求。我向他解釋了文教授與吳先生的關係特殊，與他的案子並不能相提並論而回絕了他。

——哈利·溫斯頓——

聽過哈利·溫斯頓 (Harry Winston) 這名字嗎？有一天在日內瓦，從車窗遠眺看到對岸建築有 Harry Winston 兩個白字，勾起了多年前和溫士頓公司接觸的記憶。溫斯頓氏是一八九六年生於紐約的猶太人，具有鑑識珠寶的過人天分；他父親十二歲時就曾在當舖以兩毛五美元買下鑲有寶石的戒指，兩天後以八百美元賣出，原來除了他，沒人看出戒指上鑲的是翡翠。他在十五歲時，父親舉家移往洛杉磯，在該市的比佛利開了珠寶店，並以他的名字取名哈利·溫斯頓，後來成為世界頂級的珠寶公司。電影鐵達尼號的女主角在故事的結尾拋入大海的那條寶石項鍊，就是哈利·溫士頓公司

設計的。現在日內瓦、倫敦、好萊塢比佛利、紐約、及東京銀座設有分店。溫斯頓氏現已逝世，公司由兒子羅奈德·溫斯頓接手，遠來台南看我的就是他。

他是一位風度翩翩，專攻過礦物學的學者模樣的人。他跋涉來到台南的原因是評估在台灣拓展市場的機會，彙整資料時，有人告訴他到台灣找黃某某一定可以解決問題。我和內人在台南新闢的環華俱樂部與溫斯頓氏見了面，時在當年七月。當晚溫斯頓對環華的裝潢與氣派甚為滿意，向環華的愛爾蘭人經理提出了一些舉行活動的條件，約定九月間有日本分店的店長來台南商洽細節，後來十月舉行的活動，我相信是台南空前的一件歷史性盛舉。

溫斯頓氏連同展示櫃運來了上億美元的珠寶，有的鑽石項鍊一串價值三千多萬美元，也有名牌錶款多種，全由他們的保全人員守護。展示一共三天，第一天有晚宴，宴請十桌台南名富；我因為是這事的牽線人，所以成了主賓。邀請函裡規定男上一律著深色西裝，而女士們著晚禮服，晚宴盛筵不必說，在宴會中途過後，燈光切換成品味甚高的照明，更有不知從哪裡找來身高一百七十公分以上、極為整齊的窈窕模特兒六、七人，把他們帶來的珠寶配戴在身，配上悅耳的音樂，周旋各桌展示給來賓，像是一場服裝秀，而有意購買的人，再與溫斯頓氏進行隱密的私下交易。

我萬萬也沒有想到回台主持成大醫學院之餘，會成為哈利·溫斯頓展覽的推手，可能我感興趣的是他的經歷表列有提供哈佛大學研究愛滋病的經費。後來曾受慕尼黑黑大學研究中醫藥的德國學者文樹德博士之託向溫氏爭取經費，但因時地未宜而沒成功，只成記憶裡的一道遺痕。

我本來沒有從成大退休後到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的計畫，但一九九八年夏天，該院的院外研究業務處處長張仲明教授及吳成文院長，曾經先後單獨或聯袂一起來到台南的環華俱樂部找我，敦促我接受國衛院的職位，為該院之中醫研究開創一條新的路。經幾番邀請，我有點心動，決定搬往台北。這時台北有一家我在幫忙的私人企業叫實健公司，老闆李先生是我的朋友，由他安排我們安頓在台北某地方的公寓，住在該所至今。

在到國衛院以前，發生了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台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問題，使我的工作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在十一月底赴美答辯回台後，我向教育部提出有關醫學院評鑑的建議書裡，決定初期將評鑑單位暫置於國衛院內，其原因何在當在下文一一解釋清楚。

國衛院當時也正在永久院址及工作內容上做調整與起步，我挾以建造成大的經驗到國衛院，對國衛院來說等於是如虎添翼，是個好消息，但中國醫學的研究卻觸了礁。原來，我不是文樹德教授，無法接受中醫那樣的哲學。

我為中醫研究開創了一條路，去見了不少人，舉例而言，有長庚醫院的某醫師（簡稱長庚中醫）及中華醫院的中醫兩個人。

我與長庚中醫先生在敦化北路與長春路交叉口的宏國餐廳見面，和他討論他的工作內容，他話中透露他的老師教他如何按脈，按脈可以分辨三十六種病症，包括有無懷孕等等。我聽到他口中說出這消息，馬上說我願出研究經費，看看能不能測試按脈能否決定男女性別之問題。我建議我們去找一批十來歲、皮膚細嫩、都是未成年的五十位男生及五十位女生，從皮膚的粗細摸出男女之分；測試房間則用厚布隔開，厚布只開一個洞以便一手可以伸到厚布的另一邊，長庚中醫坐在布簾的這邊，被測的男女生則不按順序坐於布簾的另一邊，目的在看長庚中醫按脈猜中的機率是多少。但我這建議立即被長庚中醫拒絕，拒絕的原因是：他的功夫還未到那地步。這理由聽起來很耳熟，是常拿來為中醫解套各種困局的方法。